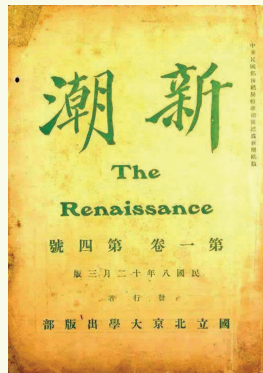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哈佛大学旧影



韦尔斯利学院旧影



提倡白话文学的《新潮》杂志(1919年12月)

◀ (上接8版)

松芳《陈寅恪的波士顿醉香楼龙虾及其他》)。不过两年多的哈佛岁月之于吴宓的意义,可能要大得多,自那时起,他与陈寅恪间开始了终生的友谊;吴宓之女学昭女士的《吴宓与陈寅恪》一书即为记述这段友谊的经典之作。而这段跨越大半个世纪、并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学林友谊的起始年,就是1919年。

就在嗣父吴建常拒绝吴宓娶雷家亲戚女儿的那年,民国三年除夕(实际已1915年2月)夜,身为凉州副都统的他,竟被诬以参与革命党的名义拘捕,在吴宓奔走与同僚的营救下,于被拘八个月后的次年9月1日释放。吴宓后于1918年初来波士顿时,认识了一位从上海自费来哈佛留学的同仁:浙江山阴人俞大维(David Yule, 1897—1993)。他俩都曾在沪上圣约翰大学读过书,共同话题本就不少。相熟后吴宓得知David的叔父,正是时任肃政使的俞明震(1860—1918,字恪士,号觚庵),曾出力救过自己的父亲,二人关系遂变得愈加非比寻常。在哈佛教授梵文与印度哲学的南亚系著名的兰曼教授(Charles Lanman, 1850—1941),本来并不为中国留学生所知,是俞大维先发现告诉吴宓;俞氏甚至还为吴宓教授过欧洲哲学史纲要。就是二人的交流中,俞氏向吴宓提到了他的表哥陈寅恪。

关于这年陈、吴交游的大

概,仅凭《吴宓日记》便班班可考其大概,这年3月26日首次出现陈寅恪,便以诗一首见赠,惹得吴宓慨叹“陈君学问渊博,识力精到,远非侪辈”;其中“等是阎浮梦里身,梦中谈梦倍酸辛”一联更是贴合吴宓性格与其当时的研究。“月旦人物”时,陈君则谓谭延闿似柴进,袁世凯为曹操,宋教仁自命诸葛亮,都见识过人。到了下月,陈君又与之论作诗非多读书,及汉宋学问之别(4月25日);陪他去“波城美术馆”(Museum of Fine Arts, Boston)(6月14日);或一同在东昇楼(The Oriental Restaurant)做东,宴请留美同学,谈及国事时“几于共洒新亭之泪矣”(6月16日)。夏校开学后,陈君又陪之共访业师白璧德(Prof. Babbitt),或劝他多买书,并亲自陪逛旧书店,使得吴宓开始节衣缩食(8月18日、22日),甚至被迫买了根本没时间看的莎翁全集,最后折价卖给孙大雨。至于二人日常讲文论学于校园湖畔,则无需日记过多记载亦可以想见。至少在下半年与陈心一女士交往提上议程之前,陈寅恪无疑是吴宓日记中的核心。

更有趣的是,有别于一贯的印象,1919年吴宓日记中的陈寅恪,更多地是位情感理论大师,始终在为吴宓躁动不安的心提供各种历史、社会的例证。那年三十岁的陈寅恪还未发表很多学术文章,但其在人文研究领域的积累,已足以震慑留美同辈;不过吴宓有意无意间将陈君对男女之情的观点

放大,为后人留下一位作为感情专家的陈寅恪。

刚认识陈君的时候,吴宓偶及婚姻之事,大约是慨叹中国人婚姻没有自由(结合了自己的经历),陈寅恪一段欧洲自

贵族王公、中人之家至下等工人皆无自由婚姻的排列,证明西洋男女之不自由有过于我国,让吴宓不由得拍案击节。接着吴宓又记下陈君一段“论情之为物”,参以西洋性学(sexology)及其余见闻,推论“情”的五重境界,前三重分别取杜丽娘、宝黛爱情及司棋、潘又安三个文学案例做比,也引得后代学者纷纷讨论陈先生的“至情说”的奥义(3月26日)。另一天,见到卖衣服的橱窗里裸体美人招牌,吴宓又与之共论西洋风俗之坏,陈君举了自己在欧洲法国意大利所见“骇人”者,如巴黎之“裸体美人戏园”云云,吴宓都如实记在日记之中。至于解释这种风潮存在的原因之一,便是物质发达,健身之术使得情欲大盛,“昔日淡薄修养之工夫不可复见”,竟然有种无可辩驳的正确性。

吴宓日记里,陈君不仅时常替自己的情感世界论理举例,也时不时留下调侃其余人情事的例子。8月20日吴宓在日记里录了一首陈寅恪的诗,但那已是他的“前作”,全诗作《影潭先生避暑居威尔士雷湖上戏作小诗藉博一笑》:

五月清阴似晚春,丛芦高柳易曛晨。少回词客哀时意,来对神仙写韵人。赤县云遮非往日,绿窗花好是闲身。频年心事秋星识,几照湖波换笑颦。

诗题中的“影潭先生”为陈、吴的共同好友、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汪懋祖(1891—1949,字典存,号影潭,苏州人)。“威尔士雷湖”即韦尔斯利学院(Wellesley College)所在地,因只招收女生而不招收男生,故也称为“韦尔斯利女子学院”。彼时汪氏的未婚妻袁世庄,正就读于Wellesley;吴宓谓汪“每夏则往与同居,盖数年矣”,陈诗的第四与七、八两句,皆为二人相爱之事。胡文辉解第四句“神仙写韵人”典出裴铏传奇《文箫》,意为抄写《唐韵》之吴彩鸾,此处即喻汪氏女友袁女士。尾联中“秋星”当皆为牛郎织女,喻二人分隔两地。陈氏此诗极为精妙,且汪、袁爱情故事

羨煞旁人,惹得吴宓多次访诗而不得,最后从事主汪影潭那里寄来,满意地抄入日记。

这年9月24日,汪懋祖自哥大人哈佛学习,吴宓非常高兴,在日记中写道:“于是此间高明之同志益多,私心颇喜”。这时的陈寅恪又展示出高出时人的见识,他说汪君来哈佛,是因为这里离韦尔斯利学院近,每周去见未婚妻方便而已,哪里是为学业或你我、才来的哈佛! (“岂为功课来哉? 岂为吾侪来哉?”)

对这位袁世庄女士,吴宓与陈寅恪二人当皆不陌生,吴与袁为清华同届同学;陈君虽未必在国内得见袁女士,但她的父亲则与陈颇有渊源。陈寅恪十年前所求学的沪上复旦公学,当日的实际管理者之一,即为她的父亲袁希涛(1866—1930,字观澜,江苏吴淞人,今属上海)。光绪季年,丹阳马相伯先生于徐家汇创办震旦,一年余便因故出走,另创复旦于吴淞。其于吴淞创校得力最多之人,即为本地教育名家袁公观澜。光宣之际,复旦办学又遭困难,适得寓居虹口的陈父陈三立(1853—1937)与郑孝胥等出手相助,学校安然度过危机(《陈三立年谱·光绪三十三年丁未(1907)》);陈父亦将自己留日归来养病的儿子送去复旦读书,1909年,陈寅恪毕业继续留学欧洲。以陈寅恪旧派士大夫的作派,袁希涛之于自己兼有业师与世伯的双重关系,则其女也即为世交相待。

1919年的袁希涛其实也在美国,以北洋政府代理教育总长的身份考察北美高等教育(事详《宝山县新志备稿·袁观澜先生事略》),不过不甚清楚他有没有来哈佛或者波士顿,见见女儿女婿;吴宓仅在自编年谱里记到教育部考察团来美数月,而他见到的副团长、北高师校长陈宝泉,还给他亲自送来高师外语系主任的offer,吴宓也颇为满意。怎想到两年之间风云变幻,没去成北高师的他,回国后便流连南京诸校。

* * *

身在北美他乡,频频新交好友,甚至适时地谈婚论嫁,都无法让吴宓回避自己身处于一波诡云谲的时代。这一年日记里,吴宓慷慨而叹“中国今日之危乱荼苦,尽人所为痛哭而长太息者也。居外国,究世界事,则比较回环,益见中国之可忧。”(7月24日)其自编年谱中载,十年自春至夏,波士顿城中以哈佛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学生多次讨论,反对巴黎和会中以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益。留美学生们因英法代表为日本张目,而一再电请美国总统威尔逊,请求其主持公道;再向谈判代表施肇基、顾维钧等施压,对和会当拒绝签字(最终亦是如此)。这一时期的吴宓日记最终遗失,似已无法具体探究吴宓当时的见闻与作为。不过他对于列强抵制不满的态度,依然昭昭可鉴。留美同学往来写作、电文等皆编辑为文章,寄回国内刊登于《申报》或《新闻报》之中,“以表现留美中国学生之活动”。其中,英文文稿由郑莱起草,而中文稿则多由吴宓起草。

吴宓强调多读中西之书、兼采古今才能谈文学的主张,是那个激荡年代里温和和保守的文学观。但他的姿态显然并不温和,说了不少气话。当时,他担心“少年学子,纷纷向风”,真正的文学将日趋堕落,良莠不齐云云(11月12日)。数年后,吴宓与同样留学归国的南京学友梅光迪、胡先啸等一起创办《学衡》杂志。温源宁著名的讽刺作品《Imperfect Understanding》(《不够知己》)里挖苦吴宓道:“作为刊物主编,吴先生的立场是,胡适博士所反对的,他全都拥护”;一股浓浓的黑色幽默。吴宓的不满与保守,让他看起来不合时宜。可是,他依然在起自1919年的数十年岁月里,选择孤独地做着守护旧家作派的堂吉诃德;即便受尽误解与嘲讽,也毫不退缩。

(作者单位: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)



俞明震



袁希涛